

【论 文】

民族政治视野下的卢旺达种族灭绝透析（上）

——纪念卢旺达大屠杀 20 周年

严 庆

摘 要：制造和固化族际差异，操纵和弥散族际敌意，蓄意设计和颠倒族际地位，诋毁和妖魔化对应群体，鼓噪和系统性组织屠戮是造成卢旺达大屠杀惨案的基本路径。防止族性刻意涂抹、无度张扬是族际政治常态化的基本要求。

关键词：族性；族际政治；族际冲突

1994 年，南非废除了目前人类历史上存在最晚的种族隔离制度，并开启了本土种族和解之门。而就在这一年，与南非不远的卢旺达却发生了震惊世界的人类悲剧——卢旺达大屠杀：屠杀行径不仅计划周密，而且得到了有系统的、准确和及时的实施。根据记录，在这场大屠杀中，每分钟有至少 20 人被杀，也就是平均每天 1 万人被杀，在 100 天时间里，超过 100 万人惨遭杀戮。研究表明，“1994 年针对图西族的杀戮是人类历史记录的一次最恶劣的事件”。¹在 100 天左右的时间里，不计其数的卢旺达妇女、儿童和男人被自己的邻居亲手钉死或砍死在自己的家中、附近的教堂里、医院里、学校里或是道路的封锁线上。²在大屠杀逝去 20 周年之后，我们仍应深刻反思是何种力量将曾经共处的卢旺达人驱使到系统屠戮的地步。

“科学”分族：卢旺达人从共处到被一分为二

聚合和分化是族类群体发展中的规律，群体之间的差异性和一致性都可以通过人为地干预得以强化或弱化。胡图族和图西族是一个群体（卢旺达人）被刻意一分为二的结果。

据史料记载，从事农业的胡图人是卢旺达的土著，较早生活在卢旺达；从事牧业的图西人来自埃塞俄比亚，在这里定居较晚。在卢旺达人的神话传说中，卢旺达的三个民族（胡图族、图西族、特瓦族）被视为一个父亲的儿子，差异只是体现在他们的秉性和所从事的行业方面。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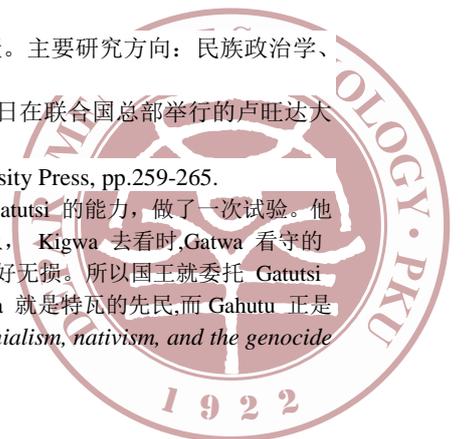
在长期的自然选择与竞争中，图西人长期处于优势，他们凭借优势创立了卢旺达传统社会特殊的 Ubuhake（“布哈克”，指“牛群契约”或“放牧契约”）制度。这一制度使图西统治者对胡图人确立了一种特殊的封建保护形式，即，宣称国王是牛群和土地的唯一所有者，也是最高的保

作者：严庆，中央民族大学中国民族理论与民族政策研究院教研室主任、教授。主要研究方向：民族政治学、民族理论与民族政策、民族教育。

1 转引自卢旺达驻美国大使穆坎塔巴纳（Mathilde Mukantabana）2014 年 1 月 15 日在联合国总部举行的卢旺达大屠杀 20 周年特别纪念活动上的发言。www.globalr2p.org/our_work/rwanda_20

2 Prunier, Gerard. 1997, *The Rwanda Crisis: History of a Genocide*,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pp.259-265.

3 传说卢旺达第一个国王 Kigwa 为了考验他的三个儿子——Gatwa、Gahutu 和 Gatutsi 的能力，做了一次试验。他给每个儿子一个盛满牛奶的葫芦，要求他们看守一个晚上。结果，到了第二天早上，Kigwa 去看时，Gatwa 看守的牛奶都被他喝光了，Gahutu 看守的牛奶被溅出了罐子，只有 Gatutsi 看守的牛奶完好无损。所以国王就委托 Gatutsi 管理贪吃的奴隶 Gatwa 和笨拙的农民 Gahutu。Gatutsi 就是图西的先民，Gatwa 就是特瓦的先民，而 Gahutu 正是胡图的先民。详见：Mamdani, Mahmood. 2001. *When victims become killers: Colonialism, nativism, and the genocide in Rwanda*,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PP.79-80.



护人，并以此建立起国王对酋长、农牧民的保护关系，使广大胡图农牧民降到农奴地位。根据布拉克制度，胡图人成为图西族领主的契约仆人，胡图人以服务和农产品换取图西人对他们的保护以及对牛和土地的使用权。

在 16 世纪卢旺达王国形成的过程中，胡图人和图西人的祖先创造了单一文化，操持共同的语言（即卢旺达语，Kinyarwanda），信仰同一种宗教，拥有同样的神话体系和礼仪法典（乌布维鲁，Ubwiru）。两个群体互相通婚，不断交流。概言之，它们具有共同的地域、经济生活和历史文化背景。

1860 年，图西人酋长鲁瓦布基里（kigeri Rwaburgiri）掌权，他利用权力将图西人与胡图人区分开来，建立了封建等级制度，并首次在胡图人与图西人之间进行了文化上的划分。瓦布基里制定了强迫劳役劳动的制度，但服役者主要是胡图族人。但从实质上来看，图西人和胡图人并不是不同的部族，他们的不同仅限于社会地位、经济实力上的差别。在全国的 18 个部落中，都生活着胡图人和图西人，但不都包含特瓦人，图西人通常地位较高。胡图和图西是氏族而不是部族。¹而且，胡图人和图西人之间可以相互转换身份，胡图妇女通过嫁给图西人而成为图西人，胡图男人可以通过拥有更多的财富和牛而成为图西人。而图西男人如果失去财富和牛就会下降为胡图人。也就是说，在传统时代，胡图人和图西人更似一种社会地位划分。²

19 世纪末，德国开始了在卢旺达的殖民统治，通过支持卢旺达的君主制实施间接统治，这样图西政治精英就和殖民势力绞合在一起。殖民者分化图西人和胡图人之间差异的做法是为了给图西人建立精英教育制度，因为德国人认为图西人比胡图人更接近雅利安人，是卢旺达天生的统治者。³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后，比利时取代德国人成为卢旺达的新宗主国。在短期继承德国殖民者的做法之后，比利时殖民者逐渐削弱君主制采取直接统治，并通过扶持图西人获取支持。

在本土熟人社会中，卢旺达人根据家族史和彼此的熟悉程度能知道谁是图西人，谁是胡图人。比利时殖民者坚持以“种族科学”区分卢旺达人，但当局却始终难以作出准确的区分划定。于是，比利时殖民者依据“种族科学”，在 1933 年至 1934 年在卢旺达进行了一次人口普查，**进行民族划分，制定了身份证制度并标明民族身份**，将图西人、胡图人和特瓦人从文化和从业名称转化为族裔和种族名称。

比利时殖民者划分民族的依据是约翰·寒凝·斯皮克关于非洲人的“种族科学”理论，斯皮克认为高个子的、特征明显的非洲人是文化和文明的先驱，他们是埃塞俄比亚大卫王的后代。斯皮克的“种族科学”假定这些非洲人在智力、价值、潜质等方面优越于当地的黑人。当比利时“接管”卢旺达之后，便运用斯皮克的“种族科学标准”测量卢旺达人的头颅、鼻子和身高，以确定谁是更高贵的种族。比利时人认为图西族人来自于埃塞俄比亚要优越于胡图族。⁴殖民者用平均 12 厘米的身高差指定图西族和胡图族，就像同一时代法国贵族与农奴之间的身高差一样。⁵

1939 年卡农·路易斯写文章认为图西人属于白种人，他写道：凭三个要素图西人的优势不容置疑：第一，从种族看，图西人具有身体优势，他们身材高大有气势，处于简单的半开化状态，他们的身高、容忍和高贵的特征使他们值得拥有威望和权威；第二，经济上，他们富有，拥有由牛群构成的财富；第三，政治上，他们是天生的指挥者，就像罗马的维吉尔人。⁶

1 Alison DesForges. 1999. Leave None to Tell the Story, *Human Rights Watch*. New York. pp. 75-79.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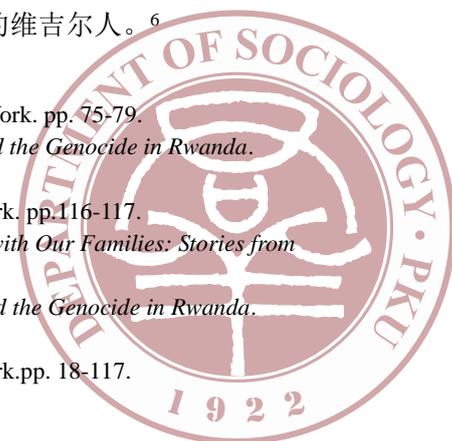
2 Mahmoud Mandani. 2001. *When Victims Become Killers: Colonialism, Nativism, and the Genocide in Rwanda*.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Princeton. p70.

3 Semujanga, Josias. 2003. Origins of Rwandan Genocide. *Humanity Books*, New York. pp.116-117.

4 Philip Gourevitch, 1998. *We Wish to Inform You that Tomorrow We Will be Killed with Our Families: Stories from Rwanda*. Farrar, Straus, and Giroux. pp.46-52.

5 Mahmoud Mandani. 2001. *When Victims Become Killers: Colonialism, Nativism, and the Genocide in Rwanda*.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Princeton. p45.

6 Semujanga, Josias. 2003. Origins of Rwandan Genocide. *Humanity Books*, New York. pp. 18-117.



比利时殖民者组织的人口普查标志着正式将图西族和胡图族分类，后来殖民当局又通过一系列的政策固化了图西人的社会地位高于胡图人的认知。比利时人硬性区分民族的做法抹掉了胡图人和图西人几代通婚的历史，也打破了以财富标准（主要参照拥有牛的数量）区分胡图人与图西人的传统做法，割裂了两个群体之间的流动性。比利时人通过全国性的人口普查和族裔划分，确定胡图人族占全国人口的 85%，图西族占 14%，特瓦族占 1%。¹族裔划分结束后，比利时殖民者向卢旺达人发放标有民族成分的身份卡，并要求成人要日常携带。胡图族和图西族之间继续通婚，但妻子不再根据丈夫的身份确定族类成分，孩子继续根据父亲的民族成分确认。卢旺达复杂的群体划分的历史传统以及胡图人和图西人可重新分类的做法结束了。

经过殖民者依据“种族科学”的刻意划分，动态社会分层意义上的图西人和胡图人被明确标示为图西族和胡图族。这样，族性差异被打造出来，并成为划分你我的边界。

设计尊卑：分而治之的策略与固化族际差异

胡图人和图西人的传统区别是卢旺达社会自身发展的结果，两个群体之间虽然存在从业、财富和地位之间的差别，但两者之间也存在一定的开放性和流动性。卢旺达传统社会的运行规则因自然生成而被相关群体认同，形成默契。而比利时殖民者的种族优劣划分，则固化了图西族和胡图族之间的尊卑和群体边界的封闭性，差异性和优劣感被打造出来。

比利时殖民政府还有意通过殖民教育和意识形态的灌输，并辅之以一系列的具体政策，使“种族集团”（这一用词在官方文件中正式采用）的界线进一步明确：它包括“种族”身份的法律化、政治地位的制度化 and 经济地位的标准化。民族身份的转变再也不可能出现，占统治和被统治地位的民族划分成为殖民制度的有机部分，两者在经济上的区别日益明显。²

在比利时殖民者建立新的殖民统治的过程中，没有皈依基督教（或天主教）或抱守君主制的首长（1931 年卢旺达国王被殖民者废黜）被替换，许多接受了殖民教育机构培养的图西族酋长的儿子进入殖民统治机制。到 20 世纪 20 年代，所有的胡图族大酋长都被替换成图西人。³根据 1959 年的统计，图西人在 45 个酋长管辖区中占有 43 个，其余两个空缺。在 559 个小酋长辖区里，图西人占有 549 个，胡图人仅占 10 个。大部分殖民政府辅助人员也由图西人担任。⁴图西人在殖民统治中的重要地位一直维持到 1959 年的“胡图革命”。

比利时殖民者还将传统君主制规定的每个卢旺达人须向社会提供公共劳动的制度延续下来，规定胡图人每年要参加 42 天的公共劳动（清理道路、沟渠等），而图西人则被免除劳动。⁴由于殖民者统治机构只招收图西人做公务员，因而殖民者开办的学校最初也只收图西人，后来虽然有的学校也招收胡图人，但胡图学生的比例受到严格的限制。而且图西学生被单独教授法语以便将来从事公共管理服务，而胡图族学生只被教授母语，目标也不是将来从政。¹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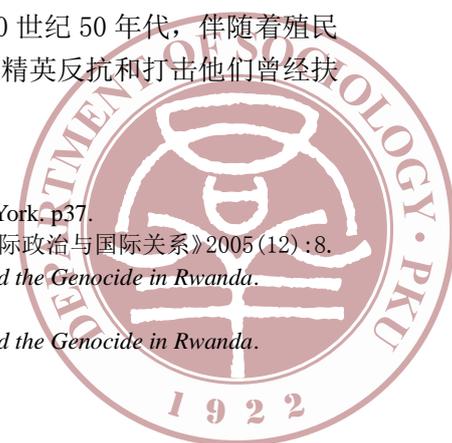
由于教育系统是私有化的，而且被天主教堂控制，招生范围也几乎完全局限于富裕的图西族孩子，胡图族人要寻求教育机会，他们的孩子就只能面对到神学学校学习的现实选择，而且学业结束后也难以找到体面的工作，因为胡图族被限制从政和经商。20 世纪 50 年代，伴随着殖民势力的消退，天主教会和比利时殖民政府又突然转而支持胡图族政治精英反抗和打击他们曾经扶持的图西族精英，又刻意将族裔扶持的对象逆转。

1 Alison DesForges.1999. Leave None to Tell the Story, *Human Rights Watch*. New York, p37.

2 李安山，“论民族、国家与国际政治的互动——对卢旺达大屠杀的反思”，《国际政治与国际关系》2005（12）：8.

3 Mahmoud Mandani.2001.*When Victims Become Killers: Colonialism, Nativism, and the Genocide in Rwanda*.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Princeton.p91.

4 Mahmoud Mandani.2001.*When Victims Become Killers: Colonialism, Nativism, and the Genocide in Rwanda*.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Princeton.pp.95-96.



从 1916 到 1945 年，在短短的 30 的时间里，比利时殖民者便改变了卢旺达传统的社会结构，原来的君主制和布哈克制度被人为制造的族裔政治制度所改造直至取代，利用选定的少数图西人实施着对整个卢旺达的统治。在联合国的压力下，比利时殖民者从 1954 年开始逐步取消布哈克制度，以期改变胡图人和图西人之间的不平衡。

图西人卢旺达传统社会进程中形成的优势被比利时殖民者放大，图也因此西人被纳入到殖民统治者的阵列。这样，因身份识别形成的族际差异与殖民者制造出的群体地位差异相互掩映，群体斗争的边界基础和阶层基础逐步形成。

此升彼降：胡图革命与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

剥夺感强、处于社会底层的群体极易被动员起来参与“翻身”斗争，在比利时殖民者看到殖民统治难以为继的时候，他们惧怕自己扶持起来的图西人掀起民族独立运动，于是他们付诸行动，致力于将胡图族与图西族权力跷跷板的两端力量互换。政治动荡因权力掌有者的换位而发生。

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非洲的反殖民斗争才初具规模。由于比利时殖民者担心图西族发起反殖民斗争，转而开始支持胡图族。比利时殖民者从 1954 年开始逐步取消布哈克制度，以期改变胡图人和图西人之间的不平衡。虽然在比利时的主导下，卢旺达进行了两次“民主”选举（1952 年与 1956 年），但胡图人依然难以撼动图西人的政治地位，于是胡图知识分子开始寻求革命，并于 1957 年发表《胡图宣言》，要求废除图西人的特权，赋予胡图人平等的权力。图西人酋长在胡图人眼里成了殖民统治者的帮凶，宣言认定胡图人与图西人之间的冲突是卢旺达问题的核心。²

1957 年 6 月《胡图宣言》的设计者格雷戈瓦·卡伊班达组建了胡图人的政党——胡图社会运动（后改为帕梅胡图民主共和运动党），图西人随之建立起自己的政党——卢旺达全国联盟，种族斗争进入到政党引领的时代。1959 年 11 月，胡图族举行“大起义”，掀起“胡图革命”，废黜王权，出现了两族间的第一次大仇杀，其间数万图西人被杀，十多万图西人逃往邻国乌干达和坦桑尼亚。1962 年独立时，从卢旺达逃往邻国的图西族难民达 15 万。1963、1967 和 1973 年又先后 3 次发生部族间大规模动乱，致使数十万人丧生。1959-1973 年的 4 次部族冲突，使大批图西人逃亡国外，据卢旺达官方统计，截至 1990 年 10 月，逃往外国的卢旺达难民已达 50 多万（其中乌干达 30 万，坦桑尼亚 5 万，扎伊尔 1 万）³。正是 1959 年的“胡图革命”为后来的冲突留下祸根：图西人遭到迫害，一部分逃到邻国，这些人及其后裔后来成为入侵卢旺达的主力。

1962 年 7 月 1 日，卢旺达正式宣布独立后，格雷戈瓦·卡伊班达成为总统，他领导的帕梅胡图民主共和运动党在卢旺达取得主导地位。格雷戈瓦·卡伊班达巩固一党独大的绝对统治，大赦了胡图族屠杀者。胡图人主掌的政府并没有废除种族歧视制度，而是反过来压制图西人，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将 9% 作为图西人受教育、从政和经商的配额上限。大多数图西人要么失去政府职员的工作，要么被贬到不重要的岗位。胡图人主掌的政府坚持使用身份证，开始系统地剥夺图西孩子的上学机会，剥夺图西人的经济机会。⁴

1972 年邻国布隆迪图西统治者对本国胡图人的屠杀，引发了卢旺达胡图人对本国图西人的清算。为了实现对图西人的防范，格雷戈瓦·卡伊班达还采取了让图西人强制搬迁、限制图西人口流动的做法。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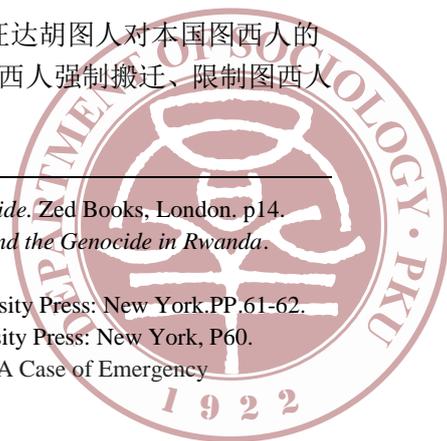
1 Melvern, Linda. 2009. *A People Betrayed: The Role of The West in Rwanda's Genocide*. Zed Books, London. p14.

2 Mamdani, Mahmood. 2001. *When Victims Become Killers: Colonialism, Nativism and the Genocide in Rwanda*.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Princeton. P116.

3 Prunier, Gérard. 1995. *The Rwanda Crisis: History of a Genocide*.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New York. PP.61-62.

4 Prunier, Gérard. 1995. *The Rwanda Crisis: History of a Genocide*.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New York, P60.

5 Hilhorst, Dorothea and van Leeuwen, Mathijs. Imidugudu, Villagisation in Rwanda A Case of Emergency



胡图族是以暴力革命的方式将比利时殖民者和图西族统治者赶下政治舞台的，在“胡图革命”中发生了针对图西人的屠杀。应该说是殖民者的种族优劣理论引发和造成了种族屠杀。福柯认为，种族主义斗争定义了一个种族——超级种族，这个种族被描绘为一个真正的种族，它拥有权力，制定规则，确定谁是它要打击的种族。¹ 由于种族歧视和种族复仇的根源没有被剔除，因而伴随权力由图西人手里转到胡图人手里，是胡图人地位的上升和图西人地位的下降。权力和地位的跷跷板效应导致了胡图人对图西人的清算和压制。

1973年7月5日哈比亚利马纳发动军事政变上台，并在1978、1983和1988年的总统选举中连任。他在20多年中采取了多种维护族际均势的政策，强调民族团结和国家统一，重视发展经济。由于部族之间、地区之间的矛盾和统治集团内部的斗争始终存在，小规模冲突依然时有发生。

得益于相对温和的政策，从1973年到1990年，图西人的生活相对平和。虽然胡图族针对图西族的暴行基本结束，但图西人的社会地位却不断受到限制。在19名内阁成员中只有1名图西人，在70名国民代表中只有2名图西人。图西人不准担任的军官，胡图族军人不准和图西妇女结婚。²哈比亚利马纳总统执政后，承袭传统做法，建立起强制义务劳动制度，规定每个卢旺达人周六都要为国家公共项目提供义务劳动，但在实践中，胡图族精英被免除参加义务劳动。

从1975年开始，哈比亚利马纳对相关政策做出调整，以减少对图西族的歧视。比如，1985年，哈比亚利马纳修订了卢旺达的教育政策。根据新的法律，把全国所有可用的教育指标分配给胡图人至少85%，把10%至14%分配给图西人，1%分配给特瓦人。³哈比亚利马纳的民族政策调整，唤起了逃至国外的图西族难民的回国愿望，但回国要求却屡遭卢旺达政府的拒绝。

1979年，因动乱逃往乌干达的数十万图西族难民在乌干达成立了政党组织——“卢旺达全国统一联盟”。在回国要求屡遭拒绝后，1987年该联盟改组为“卢旺达爱国阵线”（下文简称“爱阵”），并建立了自己的武装力量，明确表示要武装回国。1990年10月1日，近2000名流亡在乌干达的图西族难民武装分子在“爱阵”领导人弗雷德·鲁维吉耶马的率领下，从乌干达进入卢旺达北部，得到已回到国内的难民的响应，与政府军发生激烈战斗，拉开了持续3年内战的帷幕。

内战爆发后，在多国干预和调停下，哈比亚利马纳政府与“爱阵”曾多次谈判。经过两年的打打停停，双方于1992年7月10日在坦桑尼亚的阿鲁沙正式开始和平谈判。在“民主化”风潮的冲击之下，哈比亚利马纳总统于1991年6月颁布新宪法，决定实行多党民主，并于1992年4月成立了包括原执政党在内的五党联合政府（“爱阵”也在其中）。经过一年多的正式谈判，在达成了多项协议之后，哈比亚利马纳总统和“爱阵”主席卡尼耶伦圭于1993年8月4日，在阿鲁沙正式签署“卢旺达和平协定”，近3年的内战宣告结束。1994年1月5日，哈比亚利马纳宣誓就任新总统。由于党派斗争、军政矛盾、族际隔阂和政客争权，新议会陷入困境，“和平协定”难于顺利贯彻。

由于在政治、经济和文化方面都不具备族际整合的条件，在比利时殖民者的帮扶下，胡图族从权力跷跷板居下的一端上升到高位，对应性的结果则是图西族在另一端从高位降至低位。权力平衡没有实现，围绕权力的争夺就会不停歇，人数占优势的胡图族通过群体动员以期巩固不易得来的地位。

Development? Wageningen Disaster Studies, no 2, 1999. p27.

1 Foucault, Michel. 1997. *Society Must Be Defended: Lectures at the College de France, 1975-1976*, Picador: New York. PP.61-62.

2 Mamdani, Mahmood. 2001. *When Victims Become Killers: Colonialism, Nativism and the Genocide in Rwanda*.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Princeton. P141.

3 Mamdani, Mahmood. 2001. *When Victims Become Killers: Colonialism, Nativism and the Genocide in Rwanda*.



媒体造恶：“镜中指责”与对图西族的妖魔化

没有政治动员就不会产生群体政治行动，卢旺达大屠杀之前的胡图族动员主要是借助广播途径实施的。大屠杀的组织者和煽动者创制了广播“镜中指责”模式。

广播镜中指责（*accusation in a mirror*¹），是卢旺达政府中的胡图族激进派精英使用的妖魔化图西族的宣传策略，通过有目的的长期宣传，宣传者让胡图族民众相信图西族正在计划攻击他们，以此煽动胡图族先发制人，攻击图西族。

胡图族激进派的公开演说“镜中指责”的重要形式。1992年7月12日，卢旺达政府和卢旺达爱国阵线签署了停火协议，但协议遭到胡图族激进派的抵制，1992年12月6日，极端主义政党共和防卫联盟的主席马丁·布西亚纳在布塔雷的演讲中煽动：“图西族和他们的同伙会被消灭。”²当月底，在吉塞尼等地便发生了针对图西族和胡图族温和派的屠杀。1993年1月20日阿鲁沙协定签订后，一些匿名军官给哈比亚利马纳总统写了一封公开信，信中写道：您怎么会想到要组织我们对国家的叛徒施以颜色？我们已经决定对他们施以闪电般的致命打击。³巴戈索拉上校在一次演讲中宣称，“我们不能与大量的图西人和平相处，我们必须摆脱它们，消灭他们。”⁴

利用广播电台进行“镜中指责”是一个高效的途径。20世纪90年代，大多数卢旺达人不识字，无法从报纸、杂志等文字类媒质上获取信息，广播是信息传播最流行、最简单、最有效的方式。在1991年6月之前，卢旺达电台和国营广播电台是居民了解政府活动及其信息的唯一途径。1992年3月3日，卢旺达电台通过广播发出警告说，据设在肯尼亚内罗毕的一个人权团体透露，布格塞拉的图西人计划袭击当地胡图族人。其实，这一信息是人为捏造的，根本就不存在攻击计划。然而，地方当局却将这一信息作为组织胡图族居民对当地图西人进行先发制人攻击的工具，最终导致数百名图西族人被杀。这次攻击标志着媒体第一次被当作直接组织士兵、民兵和当地居民对无辜者开展大规模屠杀的工具。⁵1992年11月科林斯电台播出政客莱昂·穆盖瑟拉臭名昭著的讲话：“我们在1959年犯的致命的错误是让图西族出来……他们属于埃塞俄比亚，我们发现他们让他们回家的一个快捷方式，就是把他们扔进尼亚巴隆哥河。我一定要坚持这一点。我们必须采取行动。全力以赴消灭他们！”⁶

1993年8月卢旺达电台开始由总统的宣传工具蜕变成激进派的私人电台，并更名为米勒斯·科林斯电台。科林斯电台的设立是支持激进派军队“自卫”计划的一部分，成为煽动民众识别和反对“敌人”的工具，广播赞美胡图族，同时也极力贬低图西族。⁷科林斯电台在一百天的时间里公开宣布80万个要被消灭的人的名字。1994年5月底，费迪南多·纳希马纳在广播中称：当蟑螂进入基加利时，他们将被消灭，你知道我们已开始了消灭蟑螂的进程，来帮助我们消灭他们，我们要不计一切代价消除这些瘟疫，除了消灭他们，我们没有别的选择。⁸在屠杀过程中，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Princeton. P139.

1 1972年巴黎心理学家 Roger Muchielli 发表了《宣传及宣传心理学：了解问题 实际应用》一书，该书是一本介绍和解释群体运动的手册。内容包括介绍如何在公众中制造针对目标的义愤，提出了被称作“镜子里的指责”的宣传策略，这一策略就是先把自己要攻击的对象渲染成恶人。胡图族极端分子在制造针对图西族的屠杀时，凭借科林斯电台、康古拉杂志和其他媒体将图西人渲染成要进攻和统治胡图族的敌人。

2 Jacques Morel, *La France au Couer de Genocide des Tutsi*. Izuba, 2010.

3 Alison Des Forges .1999. Leave None to Tell the Story: Genocide in Rwanda. *Human Rights Watch*.pp. 103-104.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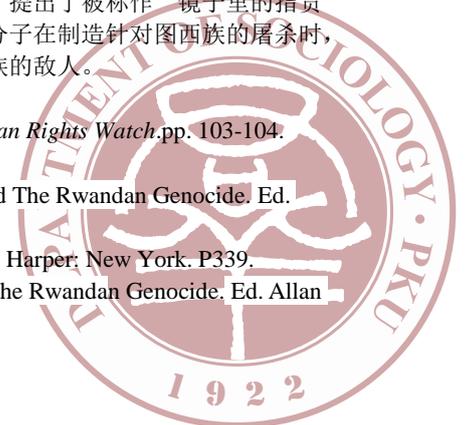
4 ICTR-98-41-T, June 11, 2004. *Prosecutor questioning of Witness*. XXY.

5 Alison Des Forges. 2007. *Call to Genocide: Radio in Rwanda, 1994*. The Media and The Rwandan Genocide. Ed. Allan Thompson. New York, NY: Pluto Press. p42.

6 Power, Samantha. 2002. *A Problem from Hell: America and the Age of Genocide*. Harper: New York. P339.

7 Alison Des Forges.2007.*Call to Genocide: Radio in Rwanda,1994*. The Media and the Rwandan Genocide. Ed. Allan Thompson. New York, NY: Pluto Press. p43.

8 RTLM, May 30, 1994. <http://www.trumanwebdesign.com/~catalina/kangura.htm>.



科林斯电台不停地煽动胡图族攻击图西人：“从全球范围内消灭图西族……一劳永逸的使他们消失。”¹利用土地的隐喻鼓励农民杀死图西族邻居和亲戚，例如“清除灌木丛”、“连根拔出毒藤”、“砍倒高的树”、“收割”。²“坟墓只有半满——谁可以帮助我们填满它。”³

科林斯电台在为期4年的时间里诋毁和攻击图西人，长期的宣传内化了胡图人仇恨图西人的情绪、态度和情感。

《康古拉》(KANGURA, 意为“唤醒它”)是进行“镜中指责”图文并茂的形式,此杂志是由卢旺达民族革命运动官员、军人和政府信息部门资助的。哈桑·尼格兹是该杂志的编辑和老板,从1990年10月卢旺达爱国阵线入侵卢旺达北部开始,《康古拉》便通过印刷故事、刊载漫画和图片反对图西人。

作为极端主义政党的顾问,尼格兹经常发表咄咄逼人的反图西人言论。⁴1990年12月,他发表了“胡图族十诫”,成为“胡图力量”的虚拟宣言,“胡图族十诫”涵盖了反图西族的全部信息,包括丑化图西族妇女、诫勉胡图族人与图西族人开展业务、建议图西族人不得服兵役、重温1959年胡图革命的思想等等。⁵

《康古拉》利用漫画、照片和图画表达政治观点,常常把图西人描绘成蟑螂、蛇、鬣狗或是大猩猩。例如,编辑合成一张1959年胡图革命领导者格雷戈瓦·卡伊班达手握砍刀的图片,再配上“有什么武器可以用来一劳永逸地打败蟑螂?”的标题。⁶有的图画将温和派的临时过渡政府总理画成躺在床上的妓女,有的则描绘出图西族人杀害他们的胡图族邻居的场景。总之,《康古拉》的作品鼓噪的是胡图族到了1957年至1961年胡图族革命那样的时刻。尼格兹在一篇题为“蟑螂生不出蝴蝶”的文章中写道:我们说蟑螂生不出蝴蝶,这是真的。一只蟑螂只能生出另一只蟑螂。卢旺达历史清晰地表明图西人总是一个样子,他们不会改变。我们国家的历史告诉我们他们是邪恶的。我们没有说错,一只蟑螂只能生出另一只蟑螂。⁷1994年1月,哈桑·恩格泽(Hassan Ngeze)还在《康古拉》中预言哈比亚利马纳总统将被杀死。该杂志还暗示将来要发生种族屠杀。⁸而这一暗示和后来总统座机被击落的事实叠合之后,其煽动的信度大大提高。

胡图族将会被图西族灭绝是康古拉舆论打造的镜像。例如在《康古拉》的文章中,作者是这样进行宣传的:请(胡图族)记住,从1959年11月开始,图西人便挑起种族间的屠杀,试图消除代表胡图人民群众利益、要求民主和社会正义的胡图族精英。自1959年以来,图西人没有一分钟放弃在卢旺达消灭胡图族知识分子和农民的想法。1990年10月图西人的进攻无疑是要通过游击战争和恐怖主义完成这样的目的。请想一想,1962年至1967年期间,“蟑螂”就是这样攻击和骚扰胡图人的。1990年10月卢旺达爱国阵线入侵卢旺达北部后,司法部长宣称图西人是卢旺达爱国阵线的帮凶。1992年秋天,地方政客莱昂·穆盖瑟拉在卢旺达北部吉塞尼面对支持者演讲时说:知道吗?你不砍断他喉咙的人现在要砍断你们的喉咙了!⁹1991年6月,哈比亚利马纳总统被迫接受多党制后,不得不接受少数党进入过渡政府,为了防止少数党削弱卢旺达民族革命运动在全国的势力,胡图族极端分子宣扬胡图族团结统一对付外部的敌人——图西族。《康古

1 DesForges, Allison. 2007. “Call to Genocide: Radio in Rwanda, 1994” in Thompson, Allan, *The Media and the Genocide*, Pluto Press: London. P48.

2 Mironko, Charles. 2007. “RTL’s Rhetoric of Ethnic Hatred in Rural Rwanda”, in Thompson, Allan, *The Media and the Genocide*, Pluto Press: London. P133.

3 African Rights. *Rwanda: Death, Despair and Defiance*. African Rights: London, 1994. P75.

4 Jean-Marie Vianney Higiro. 2007. Rwandan Private Print Media; Eve of the Genocide, in Allan Thompson, ed. *The Media and the Rwandan Genocide*, Ed. Allan Thompson. New York, NY: Pluto Press. p78.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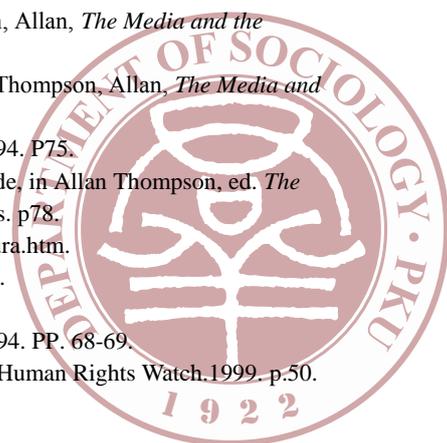
5 *Kangura*, no. 6, December 1990. <http://www.trumanwebdesign.com/~catalina/kangura.htm>.

6 *Kangura*, December 1993. <http://www.trumanwebdesign.com/~catalina/kangura.htm>.

7 <http://www.rwandafile.com/Kangura/k40r.html>

8 African Rights. *Rwanda: Death, Despair and Defiance*. African Rights: London, 1994. PP. 68-69.

9 Alison Liebhafsky Des Forges. *Leave None to Tell the Story: Genocide in Rwanda*. Human Rights Watch. 1999. p.50.



拉》告诫胡图族民众：你的团结，你的相互了解，你的统一就是你胜利的武器，你应该知道，当大多数人被分割时，少数就变成多数。图西人和胡图人之间战争的唯一解决办法，就是公众（胡图族）的觉醒。¹宣传者试图在胡图族中灌输恐惧情绪，宣传除非他们杀死图西族，否则图西族人都将设法杀死他们。

胡图族激进派“镜中指责”的宣传无非是要达到两个目的：其一，利用谎言、嘲讽、夸张和影射等手段，搞臭替罪羊，以此制造群体之间的对立；其二，通过宣传说服公众，让公众相信对方是邪恶的，以为对方支持战争、死亡、奴役、压迫、不公正和残酷施虐。²激进派为了达到妖魔化图西族的目的不惜扭曲事实，例如，尽管1959年胡图革命后，图西族被限制进入政府、军队和服务部门（法律规定图西人在公共部门的供职岗位不能超10%），但胡图族激进分子仍然宣称图西人把持了国家的财富和权力。甚至声称部分图西人在身份证上将自己伪造成胡图族。³针对图西族妖魔化的宣传为胡图族的屠杀提供了理由。2014年1月15日，在联合国纪念卢旺达大屠杀20周年大会上，联合国副秘书长扬·埃利亚松指出：我们永远不应忘记阻止卢旺达的种族大屠杀的集体失败……我们目睹着越来越多沿着宗教和族裔界线的社会裂变……**妖魔化**，我有意使用这个词，是人类恶毒攻击与自己不同信仰或民族的群体所能做来的事情。它破坏了人际交往最为核心的原则。事实上，联合国提倡的人人平等是不容置疑的真理。当人们因宗教、种族或民族的名义被侵犯或杀害时，每个人的人性都在被削弱，受害者、肇事者和旁观者都在受到摧残。⁴

按照“挫折——攻击理论（frustration-aggression theory）”，当一个群体普遍认为另一个群体可憎可恶时，仇恨的情感通常会引致群体攻击行为。也就是说，长期而普遍的媒体鼓噪，散播了胡图族对图西族的仇恨。大屠杀的情绪场已经形成，种族灭绝行为一触即发。

小结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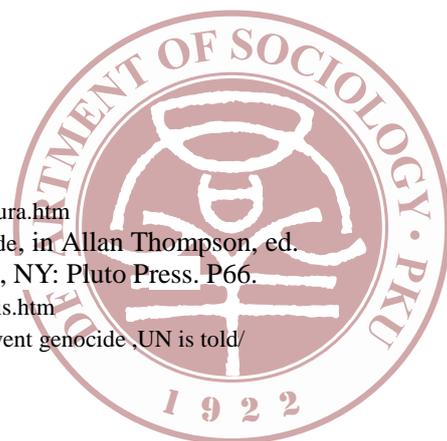
1962年斯梅尔塞提出了价值累加理论，他认为六个方面的条件不断累积就会导致群体冲突。¹通俗地讲，六个条件分别是：群体分化，互不认同；关系紧张，彼此对立；内部一致，取向一致；出现事件，引发争端；精英动员，群体亢奋；控制失位，难以调停。这六个条件每增加一个，发生群体冲突的可能性就会相应累加。具体就卢旺达而言，胡图人与图西人之间的原生差异被殖民者放大，民族成分划分固化了群体差异；胡图族与图西族之间的地位差异导致群体关系紧张、对立；长期妖魔化的宣传促使胡图族形成敌视图西族一致认知；胡图激进派政治精英的鼓噪引领着胡图族群体的政治行动倾向。可见，价值累加理论中的六个条件已经具备了四个，大屠杀正等待导火索引爆。

1 *Kangura and Kangura magazine*. <http://www.trumanwebdesign.com/~catalina/kangura.htm>

2 Jean-Marie Vianney Higiro. 2007. Rwandan Private Print Media; Eve of the Genocide, in Allan Thompson, ed. *The Media and the Rwandan Genocide*, Ed. Allan Thompson. New York, NY: Pluto Press. P66.

3 *Kangura and Kangura magazin*. <http://www.trumanwebdesign.com/~catalina/analysis.htm>

4 联合国新闻中心网站/ Evan Schneider. World must need early warning signs to prevent genocide, UN is told/ <http://www.un.org/apps/news/story.asp?>



民族政治视野下的卢旺达种族灭绝透析（下）

——纪念卢旺达大屠杀 20 周年

严 庆

【摘 要】卢旺达大屠杀由长期的族际政治非常态化而引发，全面而长期的族裔动员与政治系统自上而下的推动导致了大屠杀达到种族灭绝的规模。空前的悲剧引发了卢旺达的深刻反省与和解，也引发了国际社会关于抑制种族灭绝的道义与责任的检讨。

【关键词】族性；族际政治；族际冲突

因循价值累加理论，卢旺达大屠杀具备了群体分化、群体关系紧张、群体内部认知和行动取向一致、精英动员等四个条件，1994 年 4 月 6 日哈比亚利马纳总统座机被击落则成为了引发大屠杀的导火索，而缺乏第三方的有力干预则使得大屠杀的事态难以得到控制。

族性动员：政治系统启动了系统性种族屠戮

族性认同或族裔认同转化为政治力量必须通过政治动员的环节。没有动员就难以形成冲突的群体和规模。族际冲突的规模和惨烈程度直接与族性动员的范围、效果、效率直接相关。以政党、官僚为主体的政治系统，凭借组织化、体系化、制度化的政治机制能够大范围、高效率的实施族性动员。

从 20 世纪 90 年代开始，在胡图族所掌控的政治系统中，激进派自成体系，并将卢旺达带入社会运行的异态状况。1990 到 1993 年是大屠杀的规划和准备阶段，在这一时期，小规模屠杀时常发生，而胡图族激进派组织的大众训练、武装农民、士兵与武器准备、仇视图西人的常年宣传、允许极端分子存在、杀人者逍遥法外等等构成了社会运行的异常状态。在异常状态长期存在的情况下，法律回落。²可以说，在卢旺达，国家犯了种族灭绝罪，而法律及其约束力则消失了。

1994 年 4 月 6 日哈比亚利马纳总统的座机被击落后，有组织的针对图西族和胡图族温和派的屠杀在全国蔓延开来，军队、民兵、地方政府官员均参与其中。在有的地区，当地官员以保护图西人的噱头将当地图西人组织到运动场等地，再报告给胡图族军队和民兵，导致集体屠杀发生。

“胡图人力量”还“诉诸于召集乡村人口参加公共事务的传统方式来动员民众，只不过这次的公共事务是大规模屠杀。”³可见，动员和组织大屠杀的是一个完整的立体政治系统，胡图族激进派依靠这一政治系统，系统、高效、严密地组织了屠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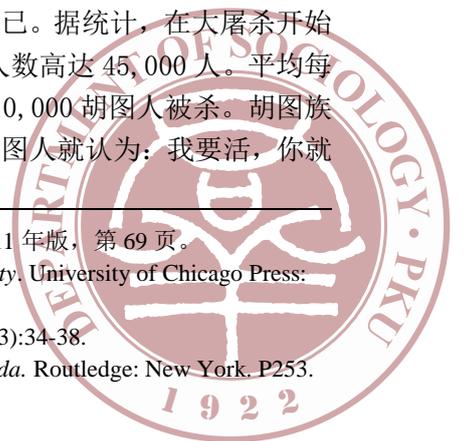
在总统座机坠毁 90 分钟后，针对胡图族温和派和图西族的大屠杀开始。这与胡图族极端分子长时间屠杀图西人的鼓噪有关，总统座机被击落只是一个导火索而已。据统计，在大屠杀开始的最初两个月，全国平均每天超过 11,500 人被杀，有的日子，死亡人数高达 45,000 人。平均每两秒钟有 1 人被杀。⁴整个大屠杀过程中，大约有 800,000 图西人和 10,000 胡图人被杀。胡图族极端分子一直在胡图人中散布图西人将要统治胡图人的信息，这样胡图人就认为：我要活，你就

1 详见拙作《冲突与整合：民族政治关系模式研究》，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1 年版，第 69 页。

2 Schmitt, Carl. 1922. *Political Theology: Four Chapters on the Concept of Sovereignty*.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Chicago. P12.

3 刘海方，“十周年后再析卢旺达‘种族’大屠杀”，《西亚非洲》（双月刊），2004(3):34-38.

4 Peterson, Scott. 2001. *Me Against My Brother: At War in Somalia, Sudan and Rwanda*. Routledge: New York. P253.



得死。这样的认知让胡图人觉得杀死图西人是必须的。就像福柯所说的：他者的死亡并不简单地意味着我才能安全的活着，他者的死亡、邪恶的种族的死亡、低劣种族的死亡才能使大家的生活更健康、更洁净。¹

极端分子多年打造了一个独特的政治气候，政府和大部分人口认为消除整个少数民族是一个可接受的答案。在近 90 天的时间里，政府执行了一个高度有组织的消灭全国图西少数民族的计划。据估计，有超过四分之三生活在卢旺达的图西人被杀。

卢旺达种族大屠杀是由胡图族激进派精英为了维护其权力，有意识地选择仇恨和恐惧造成的。面对卢旺达爱国阵线在战场上和谈判桌上的胜利，少数胡图族激进派精英将种族分裂策略改变为种族灭绝，幻想屠杀活动将恢复他们领导下的胡图族的团结，帮助他们赢得战争，或者至少增加一个有利的和平谈判机会。他们控制了国家并利用其权力、媒质进行政治动员，扩大群体性。大屠杀是一个现代精英集团刻意选择的，是一部分政客企图通过鼓励仇恨和恐惧来保存自己的权力而导致的结果。这个集团指挥成千上万的普通胡图人加入到“大屠杀运动”中来，成为处死他们邻族图西人的刽子手。“大屠杀口令是自上面下达的”，从首都基加利开始，运动迅速蔓延到每个县、公社、区和村庄。² 爱德华·基西教授在分析卢旺达大屠杀时总结道：大权在握的政府以垄断权力或建立一个所谓的“纯粹和完美”社会的名义坚决执行一项对特定群体的灭绝方案往往会获得成功。³

1994 年的卢旺达内战和种族大屠杀使卢旺达这个原本就十分贫困的国家雪上加霜，人员伤亡导致大批劳动力丧失，国家经济处于崩溃边缘。大屠杀还使国家的人口结构产生了很大的变化：成千上万的儿童在屠杀中成为孤儿，全国 14 岁以下的儿童约占总人口的 40%；许多妇女成为寡妇。此外，约 20 多万名妇女遭强奸，由于一些施暴者为艾滋病人，很多妇女生下的孩子也先天携带了艾滋病毒……估计到 2010 年，卢旺达将有 35 万艾滋孤儿。”⁴此外，大量逃亡的胡图族极端主义分子渗入邻近国家，给这些国家的安定带来负面影响。

哈比亚利马纳总统的座机被击落作为导火索，迅速引燃了胡图族对图西族的敌意，长期针对图西族妖魔化的宣传转化为消灭图西族的可怕动力。胡图族激进派政治精英借助政治系统，有计划地指挥军队、煽动民兵、激起平民投入到针对图西族的屠杀行动，人性关怀和行为理性被单纯的亢奋情绪驱逐。

弱化族性：大屠杀之后的卢旺达民族建构

冲突的结果使得久积的敌对情绪得以释放，悲剧的惨烈促使施害者良知回归。大屠杀结束后，卢旺达人在卡加梅政府的引导下，开始了恢复正义、惩治罪行、实现和解、寻求发展的社会整合进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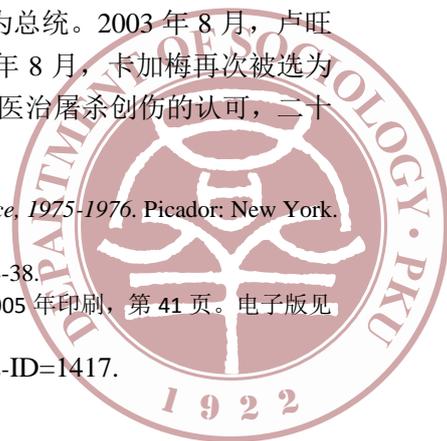
1994 年，担任爱国阵线军事领导人的卡加梅带领当时被视为反政府武装的爱国阵线击败胡图族武装，结束了举世震惊的大屠杀事件。此后，由爱国阵线组成的新政府致力于民族和解和战后重建工作。2000 年 4 月，卡加梅在议会和内阁联席会议上被推举为总统。2003 年 8 月，卢旺达举行首次多党总统大选，卡加梅以压倒性优势当选为总统。2010 年 8 月，卡加梅再次被选为总统，赢得 95.6% 的选票。卡加梅之所以连连连任，是卢旺达人对其医治屠杀创伤的认可，二十

1 Foucault, Michel. 1977. *Society Must Be Defended: Lectures at the College de France, 1975-1976*. Picador: New York. P255.

2 刘海方. 十周年后再析卢旺达“种族”大屠杀. [J]. 西亚非洲(双月刊), 2004(3):34-38.

3 大屠杀与联合国外联方案外联司:《大屠杀与联合国讨论文件杂志》，联合国 2005 年印刷，第 41 页。电子版见 <http://www.un.org/en/holocaustremembrance/>.

4 联合国新闻主页，详见：<http://www.un.org/chinese/News/fullstorynews.asp?news-ID=1417>.



年来，卢旺达政府持续疗伤，收到了较好的效果。

第一，惩治挑动种族屠杀的罪魁祸首，将种族极端主义推上道义的审判台。

为了恢复正义，在卢旺达屠杀结束后的几年中，超过 12 万人因参与杀戮被拘押，为了处置如此数量之巨的肇事者，卢旺达与联合国联合专门建立了三个层面的司法追责体系，即，卢旺达问题国际刑事法庭、卢旺达全国法院系统和加查查法庭。

1994 年 11 月，联合国在坦桑尼亚北部城市阿鲁沙设立了卢旺达问题国际刑事法庭。法庭的主要职能是起诉和审判 1994 年 1 月 1 日至 12 月 31 日期间在卢旺达和卢旺达邻国实施种族屠杀的嫌疑犯。从 1997 年 1 月开始第一次审判到 2012 年 12 月，法庭完成了试运行，有 93 人被以种族灭绝、危害人类罪和战争罪起诉。在已逮捕的 83 人中，75 人接受了审判，其中 65 人被判有罪，10 人无罪释放。卢旺达问题国际刑事法庭预计到 2014 年年底结束工作。余后的工作将由 2010 年 12 月成立的国际刑事法庭余留机制接管。¹

卢旺达国家法庭负责起诉那些被指控策划种族灭绝或犯有包括强奸在内严重暴行的嫌疑犯。到 2006 年六月，全国法院已审判大约 10,000 名种族灭绝罪嫌疑人。2007 年，卢旺达政府废除了死刑，为将种族灭绝案的审判从卢旺达问题国际刑事法庭转移到全国法院扫除了障碍。卢旺达一方面协助国际法庭认定和追捕在种族屠杀中起主要作用的人员，一方面也在本国的法院审判犯有反人类罪的主要嫌疑人。卢旺达国际刑事法庭审判高级政府官员和军人，卢旺达政府则自行负责审判较低层次的领导人和平民。1996 年 8 月，卢旺达议会通过制裁大屠杀反人类罪行的司法程序，而后，卢旺达国内的常规法庭开始遵循此法审理大屠杀案件。由于嫌疑犯数量太多，卢旺达政府转向利用传统法庭“加查查法庭”²进行审判，利用社区民间法庭来决定一些大屠杀参与者的命运。

卢旺达政府希望通过加查查法庭的审判既澄清事实，加速案件的审判，同时又促进卢旺达的民族团结和全国和解。从 2002 年 6 月到 2012 年 6 月，加查查法庭总共动用 16 万多名法官，审理大屠杀相关案件近 200 万起。³借助加查查法庭系统，由社区直选的法官负责审讯除了策划种族屠杀之外的所有种族灭绝罪嫌疑犯，如果疑犯痛改前非并寻求和解，法院一般都给予从轻判决，通常都是认罪后在家服刑或以服务社区的安排代替惩罚。全国 12,000 个加查查法庭一共审判了 120 万名疑犯。加查查的庭审方式，一方面，通过让受害者了解自己家人和亲属死亡真相的方式，得到了安慰，促进了和解；另一方面，它也给肇事者在自己的社区面前承认罪行、表示忏悔、请求宽恕提供了机会。加查查法庭于 2012 年 5 月 4 日正式关闭。

第二，从政府到社会致力于民族和解，消除刻意的族类划分。

在平衡争议、揭露真相、寻求和平与安全的同时，卢旺达的和解进程也聚焦于卢旺达认同的重建。卢旺达的现行宪法规定人人享有平等的权利，反对种族歧视、种族灭绝和反对意识形态分裂的法律也已通过。多年来卢旺达通过多种途径和方式促进民族和解，建构国家。

1999 年专门成立国家团结与和解委员会，致力于民族和解：实施和平教育计划，在澄清卢旺达的历史和人口不同起源的基础上，弘扬爱国主义，抨击种族灭绝的意识形态，从 1999 年到 2009 年，有超过 9 万的卢旺达人参与了这一计划；2007 年设立培养社会建设领导人项目，从 2007 年到 2009 年，有 115,228 人参加了这一项目；通过开办讲座，有针对性地培训基层领导、政党

1 联合国网站资料. <http://www.un.org/en/preventgenocide/rwanda/about/bgjustice.shtml>

2 “加查查”一词源于卢旺达语，“加查查法庭”的意思是“草地上的司法审判”，意即民间团体成员充当“法官”。传统上，卢旺达人一个村庄或部族的民众往往聚集在一片草地上，解决各家庭间在土地或牧场等方面的矛盾或争端，法官即是各户的家长们，主要目的是重建各个家庭因这些矛盾而受损的社会关系，进而最终达成整个群体内部的和解。

3 袁亮，“卢旺达传统法院完成审判卢旺达大屠杀嫌犯使命”，新华网

[/http://www.sogou.com/websnapshot?ie=utf8&url=http%3A%2F%2Fnews.qq.com%2Fa%2F20120614%2F001558.htm&did](http://www.sogou.com/websnapshot?ie=utf8&url=http%3A%2F%2Fnews.qq.com%2Fa%2F20120614%2F001558.htm&did)



领袖，还对青年和妇女进行创伤医治心理辅导，指导建立缓解和解决冲突的早期预警系统；自从2000年以来，举办多次国家首脑会议，讨论正义、善治、人权、国家安全和国家历史等议题；开展研究，深刻分析发生冲突的原因以及如何缓解和解决冲突。

同时，开始从根源上消除种族灭绝色彩的意识形态，改变人们的身份认同，不再以“胡图人”或“图西人”来界定国民的身份。卡加梅政府认识到，要防止大屠杀的悲剧重演，就不能再用传统的种族概念来划分卢旺达人。卢旺达政府已颁布法令，禁止任何部门或个人沿用胡图族与图西族的二分法。现在，只要公开宣扬两族的区别，就会受到严厉惩罚。卡加梅曾说：“政府的民族和解政策将给所有人带来新的开始和希望，让我们翻过历史中的悲伤一页，建设一个适合所有人的国家。如果你问我，我会告诉你，我既不是图西人也不是胡图人，因为我是卢旺达人。”¹

再者，建立种族屠杀纪念设施，让人们从历史中汲取教训，警醒自我。卢旺达政府在很多当年大屠杀的重要地点，都保留了遗址或建起了纪念馆。例如，种族大屠杀纪念馆里陈放了数万具骷髅，以血淋淋的事实向世人展示那场屠杀的残酷和非理性。大屠杀的一些重要见证物也被保留了下来。卢旺达议会大厦布满弹孔，政府之所以决定不修葺它的外立面，就是为了警示后人。联合国大会于2003年做出决定，将4月7日设立为“卢旺达大屠杀国际反思日”²。一些外国政要也出席相关纪念活动，反思当年的失职。

更进一步，倡导宽容，引导全社会接纳一些当年参加过屠杀的人回归社会。1994年的屠杀，主要是胡图族人针对图西族人的屠杀。而胡图人占卢旺达人口的绝大多数，要惩治所有犯下屠杀罪的人几乎是不可能的，因此只能审判他们中的为首者。若不宽恕一些起次要作用的人，种族和解也就无从谈起。卢旺达政府先后释放了2.5万名参加过种族大屠杀的嫌疑犯。当年被卡加梅领导的卢旺达爱国阵线赶到国外的胡图族武装中的一些人，流亡若干年后已经回国。卡加梅号召民众抛开仇怨，接纳他们作为邻居。宽恕与和解虽然不是万能的，但它们无疑是改变我们个人乃至整个世界的工具。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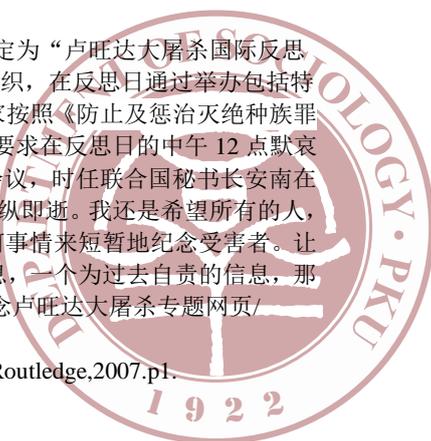
第三，通过促进经济社会发展赋予卢旺达人新的希望。

从另一角度讲，卢旺达部族仇杀也是一场土地的战争。卢旺达国土仅2.6万平方公里。人口在独立初期约300万，1978年人口调查为483.1万，1991年8月15日人口调查为716.5万，1991年人口调查的人口密度为每平方公里272人。有媒体认为目前卢旺达人口已超过800万，人口密度每平方公里超过300人，是非洲人口密度最高的国家，也是世界上出生率最高的国家之一。据世界银行提供的材料，1965-1990年间年平均人口增长率为3.3%，育龄妇女占人口的比例，1965年为45%，1990年为44%。平均每个妇女怀10胎，成活率为8.3个。全国一半土地是农业用地，其余是草场和森林。由于过度垦殖，导致土地生产能力下降。一个农民平均耕种不到半公顷土地。许多激进的胡图人组建了民兵和敢死队，没有田地的农家子女也应征加入这支内战大军。他们横行乡里，不分胡图人还是图西人，形成一场自相残杀的混战。对他们来说，实际上是一场争夺土

1 刘中伟，大屠杀过后15年卢旺达：“千山之国”的重生。详见：
<http://news.sohu.com/20100318/n270904141.shtml>

2 2003年12月23日，联合国大会通过了第A/RES/58/234决议，将4月7日确定为“卢旺达大屠杀国际反思日”。决议“鼓励各会员国、联合国各机构、其他相关国际组织以及民间社会组织，在反思日通过举办包括特别纪念活动在内的活动形式，纪念遭受种族灭绝受害者。该决议还呼吁所有国家按照《防止及惩治灭绝种族罪公约》采取行动，以确保不再发生1994年卢旺达大屠杀类似事件。卢旺达政府要求在反思日的中午12点默哀一分钟。2004年3月26日，加拿大政府和卢旺达政府在联合国联合举办纪念会议，时任联合国秘书长安南在讲话中指出：这样一分钟的沉默具有团结世界的潜力，尽管，全球团结的理念稍纵即逝。我还是希望所有的人，无论你身处何方，在拥挤的城市，还是偏远的农村，抛开那天中午你所做的任何事情来短暂地纪念受害者。让我们以这种方式实现十年前为实现的联合。让我们能用的一分钟，发送一个信息，一个为过去自责的信息，那就是决不让这样的悲剧再次发生，让这一信息在未来回荡多年。详见联合国纪念卢旺达大屠杀专题网页/
<http://www.un.org/events/rwanda/backgrounder.html>

3 Everett L. Worthington, Jr. *Forgiveness and Reconciliation: Theory and Application*. Routledge, 2007. p1.



地的斗争。¹历史学家如杰拉德·布鲁尼耶相信 1994 年种族大屠杀可以部分归因于人口密度。²因此，发展经济、消除贫困是卢旺达政府的主要任务。卡加梅陆续采取了一系列措施摆脱过去对法国的依附，包括定英语为官方语言，加入英联邦(卢旺达和英国在殖民时代无任何隶属渊源)，重新推动经济多元化，拒绝加入法国倡导的“大湖区稳定计划”等，甚至一度 and 法国断交。通过这些努力，卢旺达基本摆脱了依附于法国的单一型经济，这种新的、多元化发展的经济虽然缺乏财源，却更加平稳，不易受国际市场波动的影响。³而国际市场波动及其带来冲击正是大部分非洲国家经济大起大落的症结所在。

2000 年经济学家杂志曾以“绝望的非洲”作封面，2011 年 12 月版的经济学家则以“非洲崛起”作为封面，大大赞扬卢旺达近些年所取得的成绩。2000 年，卢旺达政府出台了“2020 年远景规划”，2007 年又出台了“经济发展与减贫战略”，为未来发展绘制了蓝图。2010 年 8 月，世界银行向卢旺达政府颁发奖杯，表彰其在全球商业环境评估中的明显进步，当时卢旺达的排名已经从全球 150 名升至 67 名。2012 年这一名次上升到 45 位。⁴

首都基加利越来越清洁，清洁工作成为了促进国民团结和自信的载体。在清扫日，总统和市民一起参加城市清洁工作，这也是重塑内战和屠杀以来的社会、增强卢旺达人团结感的方式之一。由于卢旺达的投资环境在不断得到改善，也有人将卢旺达看作是非洲的新加坡。根据世界银行和国际金融公司的统计，在卢旺达投资开业整个手续只需三天，而在撒哈拉以南非洲的其他国家，则平均需要 34 天。⁵在卢旺达注册一间公司只需要三天时间，而且费用非常低，在非洲国家中仅次于南非与毛里求斯。卢旺达近年在反腐败上也颇下功夫：几个部长级的人物因为贪污腐败而锒铛入狱；国际透明组织估计，卢旺达的腐败事件比希腊和意大利都要少。卢旺达还获得了“非洲女性天堂”的称号：2008 年立法选举中，女性议员比率高达 56%，居全球第一；许多卢旺达女政治家在政府中担任部长要职。虽然这一称号的获得与商业环境的改善并无多大关系，但至少可以看出卢旺达的宽容与进步。⁶

2013 年 3 月 14 日联合国开发计划署发布《2013 年人类发展报告》，指出：发展中国家脱贫成绩显著，其中阿富汗、塞拉利昂、埃塞俄比亚、卢旺达、安哥拉等 14 个国家自 2000 年以来人类发展指数（HDI）年增 2% 以上。据卢旺达 2013 年公布的第三次居民生活综合调查结果显示，卢旺达自 2006 年以来贫困率已下降 11.8%，比 2000-2006 年间贫困率下降速度快 6 倍。⁷

回归正义是治愈族际冲突创伤一个至关重要的因素，卢旺达医治大屠杀创伤是以惩治罪犯为发端的，没有惩治就难以形成正义，惩治罪犯，有助于重新建立起尊重和公平的族际关系。恢复正义，使得卢旺达人从恐怖的去寻求真相，促进理解与信任，没有信任，人们就会没有安全感；没有信任，就没有对未来的信心。族际和解需要淡化族际认知边界，需要强化共同的国家认同。和解是医治遭到破坏的族际关系，需要经济正义的基础，需要政治、社会权力的分享与协商，和解是要找到和以前的敌人一起生活的方式，不一定要爱他们，或者原谅他们，或以任何方式忘记过去，而是要与之共存，为了要和他们更好地分享社会而提高合作程度，是为了克服群体性的质疑、偏见和刻板印象。尽管卢旺达实现真正持久民族和解的路还很长，但他们已经在路上。

1 徐济明，“卢旺达内战的由来与前景”，《西亚非洲》(双月刊),1994(5):44.

2 译自英文维基百科。详见：http://en.wikipedia.org/wiki/Rwandan_Genocide.

3 非洲卢旺达：从大屠杀到“非洲楷模”，中国政府创新网，详见：<http://www.chinainnovations.org/item.aspx?id=35193>

4 详见联合国网站/2013 年人类发展报告《南方的崛起：多元化世界中的人类进步》
<http://www.un.org/zh/development/hdr/2013/>.

5 Jaco Maritz. Rwanda – a tiny country that has made great progress. June 27, 2013
<http://www.howwemadeitinafrica.com>

6 唐焯，“卢旺达：非洲的新加坡”，《解放日报》2012-05-12.

7 详见联合国网站/2013 年人类发展报告《南方的崛起：多元化世界中的人类进步》



道德责任：消除因差异引发的群体冲突任重道远

应对大规模、高强度的族际冲突离不开强有力的第三方的介入与干预，否则冲突的一方就会凭借力量强势，致使冲突的结果单向发展，其结果往往是种族灭绝、强制迁移、强制同化或单方面适应。¹造成卢旺达大屠杀的外部因素之一就是缺乏来自国际社会的“拉架者”。也正是卢旺达的种族灭绝，进一步引发了国际社会关于如何处理国家主权与保护人权关系的争议与思考。

前联合国秘书长安南认为：（20世纪）90年代卢旺达和南联盟所发生的大屠杀是整个人类的耻辱，人类应当就这一事件进行深刻反思。2005年联合国提出“保护的责任”（The responsibility to protect, 简称 R2P 或 RTOP）的倡议，这一协议聚焦于干预和制止种族灭绝、战争犯罪、危害人类罪和种族清洗罪四类危及大规模人口的罪行。提出三个基础性“支柱”：一个国家有责任保护其人民免遭种族灭绝、战争罪、危害人类罪和种族清洗等罪行的伤害；国际社会有责任协助相关国家履行其首要职责；如果相关国家拒绝或无能力对本国国民进行保护，国际社会则有责任进行干预，包括通过强制措施、实施经济制裁等，军事干预是最后的手段。²

国际政坛提出“保护的责任”框架的动力来自于对卢旺达大屠杀的反思，反思认为缺乏强有力的第三方干预是导致卢旺达大屠杀持续和恶化的原因之一。大屠杀发生后，以比利时、法国、意大利和美国士兵组成的联合国维和部队奉命撤离卢旺达，他们除了保护自己的同胞安全撤离外，没有对大屠杀进行任何有效的干预。屠杀发生之初，联合国虽然还在卢旺达设有一支实施监控任务的维和部队，也试图尝试调解停火，但心有余而力不足。1994年4月21日，随着危机的加深，联合国通过投票将在卢旺达的维和部队由2500减少到270人。5月17日，联合国决定建立一支由5500名非洲国家士兵组成的武装力量，由于资金缺乏，也未能及时行动。³

1994年6月22日，联合国才授权2500名法国干预部队开进卢旺达西部，将吉孔戈罗周围占卢旺达约1/5面积的地区划为“人道主义和平区”，禁止任何武装力量进入。但由于以前法国支持胡图族主政的卢旺达政府，因而法国的介入遭到爱国阵线的反对，爱国阵线指责法国人帮助许多滥杀无辜的胡图人。与此同时，曾要求法国部署部队的卢旺达政府方面，也因为法国没能有效的阻挡爱国阵线武装前进，也对法国存有戒心。7月16日起法国士兵数次试图进入安全区的爱国阵线武装发生冲突。爱国阵线及政府的反对派明确要求法军撤出卢旺达。受命组织卢旺达全国团结政府的福斯坦·图瓦吉拉蒙古7月7日在布鲁塞尔说，法国军队应当在7月底撤离卢旺达领土，并声称他坚决反对法国参与联合国下一阶段的行动。由于处在双方均不信任的状态，法国则难以实施有效的干预。

由于国内缺乏民主、法治、权威和经济基础，单纯依靠卢旺达自身解决积聚已久的族际矛盾是不现实的。哈比亚利马纳总统曾一度采取各种措施，调整族际关系，纠正过激的部族主义政策，但是，由于缺少实际行动和实质性改观，政府对胡图人中的激进派采取了“睁一只眼闭一只眼”的政策，总统座机遇难就是这种政策的可悲结局。⁴导致这一局面的原因既来自于政治、经济和文化层面，也来自于缺乏指导族际关系调处的道德高度。

“预防灭绝种族行为是我们共同的责任。各国必须履行自己根据国际法承担的防止虐待和保护本国人民的义务。只有勇于应对这些挑战，我们才能无愧于历经苦难而不屈的幸存者，才能真正告慰19年前卢旺达的死难者。”⁵

<http://www.un.org/zh/development/hdr/2013/>

1 详见拙作《冲突与整合：民族政治关系模式研究》，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1年版，第133页。

2 Badescu, Cristina G. 2010. *Humanitarian intervention and the responsibility to protect: Security and human rights*. New York, NY: Taylor and Francis e-Library. p110.

3 李安山，“论民族、国家与国际政治的互动——对卢旺达大屠杀的反思”，《世界经济与政治》2005(12):13.

4 葛公尚，“卢旺达——布隆迪部族冲突透视”，《世界民族》1995(1):15.

5 联合国秘书长潘基文在卢旺达境内灭绝种族事件19周年纪念日上的讲话。

<http://www.un.org/zh/preventgenocide/rwanda/index.shtml>



结 语

早在卢旺达王国建立的过程中，统治者开始以等级制的框架进行胡图族和图西族的分类；后来的殖民者，采纳了这一分类策略，进一步固化了两族边界，并通过身份证制度锻造认同隔离；族际压迫终于在反殖民统治的斗争中转化为政治精英策动的族际争斗，而殖民者的离去又为族际军事斗争留下了权力空间，大规模的种族屠戮悲剧式地发生；直到以图西族为主体的爱国阵线取得政权，族际冲突及其引发的国家政局动荡才得停止。

一个文化相近的共同体，可以被建构出差异并且一分为二，而种族主义又将建构出的差异制度化，两个群体被教化为彼此不同。巨大的屠戮灾难发生后，人们才深刻认知到制造族际边界的弊端，于是新的政府开始填平身份证制度挖掘的族际沟壑，并通过民族和解措施医治族际关系创伤，政府主导的经济社会发展在彰显国家的可依赖性，卢旺达人恨别二元对立的种族政治，开始走上了民族国家道路。

卢旺达针对图西族的屠杀也引起了人类的共同反思，并在痛定思痛之后思考如何共同担当责任。2005年11月1日联合国第六十届会议第42次全体会议通过A/RES/60/7文件，文件指出：毫无保留地谴责一切针对不同族裔、不同宗教信仰的个人或团体的宗教不容忍、煽动、骚扰或暴力行为，不论这些行为发生在何处。¹

【论 文】

俄语“民族”（**нация**）概念的内涵及其论争*

何俊芳 王浩宇²

1 具体见联合国大会60届会议文件。http://www.un.org/chinese/ga/60/docs/ares60_1.htm

* 本文原载《世界民族》2014年第1期。

2 何俊芳，中央民族大学民族学与社会学学院教授；王浩宇，中央民族大学民族学与社会学学院2013级在读博士生。

